

按照常识，考古就是发现与研究古人的物质遗存，都是死东西。说是“死东西”，不仅是指使用者都已经故去，更是指这些东西难以理解，我们又无法穿越到过去，看见其使用场景，从使用者那里了解其意图。考古人只能运用多方面的信息去推导，这也就构成了“考古学的技艺”。要让死东西说话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物质遗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零碎、残缺的，要凭借极有限的材料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就一定需要一个可以参考的模板。就像我们在拼合复原陶器时一样，只要知道残留的陶片能够呈现原来的器型是怎样的，就可以把器物复原出来。史前考古领域通常利用民族考古的手段来获取模板，因此通常也把民族考古称为“活态考古”（living archaeology）。考古学家仿佛人类学家一样，可以直接观察到人们的生活面貌。活态考古能够提供的信息丰富度是一般考古工作无法比拟的，能够帮助考古学家实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不过，其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存在跨文化的差异性问题的，毕竟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即便生产方式差不多，生活面貌也是千差万别的。

如果一个地方的历史是连续的，而且文献资料也相当完整，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开展考古工作，就可以不用活态考古提供的模板，因为它本身就是活态考古。最近在故宫举办的展览“九重之下：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就非常符合这样的要求。元、明、清时故宫这片区域一直是皇宫的位置所在，至于文献资料，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完善了，尤其是故宫还在使用中，建筑群仍然保存完整。在这里参观考古展，就仿佛是在听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回忆自己的人生往事。故宫考古揭示的是故宫自身的历史，反过来说，故宫的历史本身又是理解出土物质遗存的有效手段，考古发掘则是进一步丰富故宫的历史。如此滚动的循环使得故宫考古成为活态考古的样板，一个不同于民族考古的样板。故宫考古所依赖的方法，考古学上称为“直接历史法”，也就是研究自身的历史，其可靠性在考古推理中是无与伦比的。“九重之下：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正是这一方法的生动写照。

2020年至2025年，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发掘造办处旧址，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出土遗存可以分为元代、明早期、明中晚期、清早期、清中晚期共五个时期。今天的故宫就坐落在元代宫城遗址上，造办处的位置位于元代宫城的西南部。到了明朝早期，这里曾是大善殿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在发掘区内揭露出来三处房址与一处工艺精湛的墙基，显示出明朝早期无与伦比的组织管理能力。嘉靖十五年，这个区域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造，慈宁宫落成，也奠定了后来的院落格局。此后这里更是内府衙门、厂库之所在。到了清朝，这里变成了造办处，康熙年间设立玉作坊，此次发掘中还揭露出铜作坊、做钟处。在做钟处房址中发现多种西洋钟表构件，包括表盘及装饰配件、动力系统和表盘计时零部件等。乾隆十七年（1752年），造办处的房屋达到280余间，成为皇家御用品制作的专门机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皇宫内居然有手工作坊区。文献记载，这里鼎盛时期有42个作坊。不过，对于从事都城考古的研究者而言，这可能并不稀罕，从夏都二里头遗址到安阳殷墟，都发现有作坊区，历代都城中都有类似发现。清朝在宫闱范围内有作坊区，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赓续。如此的一脉相承，也让我们说的活态考古多了一层意思。

走进位于永寿宫的展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考古地层模型，1：1复制的地层剖面，这个剖面东西长6.4米，最深处距地表4.5米。剖面边上还陈列着一座按1：3比例缩小的碌墩模型，实体太大了，展厅中无法陈列。发掘揭示出来的碌墩有4个，每个相距11米，呈正方形布局，在它之上应该是大型的建筑。媒体报道中称此次发掘揭开了“紫禁城下的大地史书”。没有哪种展示形式比这个模型更好了，参观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元明清不同时代地层的叠压打破关系。这个地层也非常具体地呈现了什么是考古学家的技艺，虽然三个朝代界限分明，实际上遗迹的类型却多种多样。后一个朝代在重新建设之前，需要清理地面，需要挖掘基槽，堆砌碌墩。挖掘出来的废土填埋在旁边低洼的地方，这些详细的活动都记录在考古地层上。当我们看到这幅竖立起来的考古地层图时，也仿佛在阅读

九重之下：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观后感

陈胜前



一段情节曲折的故事。地层的包含物指示不同地层的年代，其中暗含着考古地层学的秘密：地层的年代总是由年代最晚的包含物指示。

考古发掘的出土物数量可观，类型多样，不过大多破碎、零散，是古人当作垃圾填埋的，其中还包括一些建筑构件、工人生活用瓷器碎片、作坊的玉料等。也说明当时垃圾处理还是就地处理的，尽管造办处就在三大殿附近。当然，对于考古人来说，有指示年代包含物的地层是相当理想的，也算是对都城考古复杂地层的一点回馈。在这样一个连续使用几百年又经过三次朝代更迭的宫阙区范围内，建筑反复营建，又不断废弃，要把每一次事件都区分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发掘者精细的发掘技巧以及对不同朝代物质文化的熟谙。明代早期造办处的位置是某座宫殿的一角，这座建筑至少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就已经消失了。因为在这座宫殿建筑的碌墩之上，已经叠压着由黄土碎砖夯筑的嘉靖时期的地基，其中居然有一块明确标有“嘉靖十三年”的纪年砖，明确地卡住年代的下限，即不可能早于这个时代，否则这块砖不可能会被填埋在地基之中，这个发现为判断年代提供了极好的证据材料。

从文献我们知道造办处是清代负责制造、维修和贮藏金、玉、铜器、珐琅、玻璃器皿、武器盔甲等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其职能还涉及装修陈设、舆图绘制、兵工制造等，这个“紫禁城的手工艺艺术中心”存续了大约230年。此次出土遗存中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近200件钟表配件，包括金属框架、齿轮等，体现18世纪中西技术交流的情况。若是没有考古发掘，是很难了解相关生产过程的。另一类遗存更加罕见，那就是匠人的生活遗物，包括匠人使用的刷子、棋子、骨牌及饮食残留物（如蟹钳、动物骨头），展现了工匠日常生活。文献记载中是不大可能记录工匠的日常生活的，而这正是考古工作的强项，发现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在众多出土文物中，还有一批元代花纹砖引人注目。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元代龙纹砖被砌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池子，是在明代作为建筑材料被重新使用的。明代宫建紫禁城时，充分利用了这批元代的建筑材料。这些龙纹砖与黑龙江上京城、北京金中都等元代遗址发现的同类砖瓦十分接近，都是皇家等级的，也反映出金元明三代时期建筑工艺和工匠技艺的传承。

一脉相承，故宫考古仿佛就是中国考古的“隐喻”或突出的代表。连续的历史，稳定的意义传承，还有文献的辅助，文字系统也没有改变，我们通过考古发掘解释的中华文明与今天的中华文明仍然是无缝连接的。当我们看到史前的陶器的时候，会想到三足鼎立、鼎鼎有名、钟鸣鼎食……这些在中国历史尚在传承，在今天的语言中流传。这样的文化仍然是活态的，我们称之为“活态考古”也就是合适的。这样的状况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古老文明发祥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在那些地方，考古揭开的是一个与现实生活悬隔开来的世界，文字已经改变，物质的文化意义也发生了改变，甚至生活在那里的人群都已发生了改变。对比而言，中国考古是活态的，可以将其之视为中国考古学一项突出的特色，因为世界上确实没有其他地方能够与中国相提并论的。

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考古学一项绝无仅有的特色，它是活态的考古。故宫考古以一个绝佳的范例演示了这样的特色，也是活态考古的标签。让我们记住中国考古学的这个特征，用我们的努力赓续中华文明传统，让这棵古老的文明之树万古长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为配合《柬埔寨考古学史》的撰写，笔者于2025年1月至2月间对柬埔寨境内的三处考古遗址进行了实地的调研工作。1月对马德望省境内的朗斯滨(Laang Spean)遗址和茶胶省境内的吴哥博雷(Angkor Borei)遗址进行了调研；2月对暹粒省境内的库伦山(Phnom Kulen)上的安隆通(Anlong Thom)窑址实地调研。

这三处遗址中，朗斯滨遗址是现代柬埔寨史前遗址工作开展最早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不仅能够追溯柬埔寨的考古（拉伸了吴哥时期之前的数千年历史），还能够追溯柬埔寨的生物、地质和环境历史。吴哥博雷遗址是前吴哥时期(约公元100年至公元800年)一处重要的城址，是印度教文化在东南亚大陆传播的第一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安隆通窑址是吴哥时期(约公元802年至公元1431年)一处早期重要的陶窑遗址。早在法国殖民时期就已经被发现,但是对窑址的认识一直处于“模糊”状态，尤其是对吴哥时期后期的窑址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该窑址是否受到中国陶工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下面将对这三处遗址的调研情况进行逐一介绍:(本报拟分三期刊发)

东南亚大陆最早的史前人类洞穴之一——朗斯滨遗址

在柬埔寨,只有一处史前遗址,即马德望省的朗斯滨洞穴遗址。朗斯滨遗址的名字来源于法国人穆雷(the Mourers)夫妇。在197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穆雷写道,该洞穴内“由众多通风口照亮,这些通风口由拱门形状的天然拱顶隔开”,根据这些拱门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Laang Spean,意思是桥洞(Cave of Bridges)。

马德望地区是柬埔寨三大石灰岩地层之一。该地区二叠纪石灰岩以残丘形式出现,高度可达300米。这些石灰岩“Phnom”(高棉语中的天然山峰)被植被茂密地覆盖,显示出强烈的“地表喀斯特特征”。由于风化作用,它们被大量岩石、巨石堆积物包围,从山脚到垂直悬崖或山顶形成了相对陡峭的斜坡。

朗斯滨遗址位于柬埔寨马德望省省会西南约40公里处,一座被称为Phnom Teak Treang石灰岩小山之上。Phnom Teak Treang是一座低矮的椭圆形石灰岩小山,几乎处于溶解状态。它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500米,高出周围低地约100米(图1)。主洞穴很小,但有许多洞室,洞口位于不同的位置。它位于洞里萨湖的支流之一桑克(Sangke)河的西侧。该地区的特点是冲积平原平坦,海拔约30米。该平原主要用于农业,冲积土壤沿着位于东部约4公里的桑克河沿线从东北向西南延伸。

朗斯滨遗址洞顶中部的一块大石头坍塌后露出了洞穴顶部。这一事件使洞穴地面中部的大片区域被掉下的石块所覆盖,导致发掘工作难以进行。同时,这些石块也间接将洞穴表面分为三个主要部分(1、2、3号室)和2号室内的三个区域(图2)。

朗斯滨遗址的主室进深约116米,宽约25米,高约30米(图3)。洞穴内占地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在洞穴入口朝向西南方的山谷中,那里有一处被称为“Chanob”的泉眼,距离此山300米。以前的居民可能将此泉作为主要水源。

当穆雷·肖维雷(Mourer Chauviré)和她的丈夫罗兰·穆雷(Roland Mourer)于1964年踏上柬埔寨时,他们从未想过会改变历史。穆雷、肖维雷接受过古鸟类学家的培训。罗兰·穆雷正在磅清扬省完成史前陶瓷和现代陶器制作的博士学位。两人都曾参与法国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发掘工作。他们的发现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改变了公认的柬埔寨史前史的记录。穆雷夫妇在1965年至1969年间进行了首次发掘,并发现了史前人类在朗斯滨遗址内居住的证据,距今已6240年。出土遗物包括角岩工具、陶器、烧焦的动物骨头、碳化物、软体动物壳和各种微型动物遗骸。在更深的中间层,他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它们与东南亚发现的所谓和平文化(Hoabinhian)遗址有相似之处,表明从缅甸到越南的一群早期人类可能拥有共同的文化因素”。之后的三十年战争和十年的扫雷阻碍了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掘。

“和平文化”一词源自“和平”遗址,该文化以越南北部的和平省命名。1926年至1932年间,来自法国远东学院的法国考古学家玛德琳·科拉尼(Madeleine Colani)在越南发掘了许多和平文化遗址。1932年初,第一届远东史前史学大会在河内举行,会议同意使用科拉尼提出的“和平文化”一词来定义居住在该地区的特定文化。在东南亚,“和平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常用术语,用来描述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时间段内的石器工业。这些石器工业具有独特的定居模式、自给自足的经济和技术。

直到2009年,法国—柬埔寨史前研究团(French-Cambodia Prehistoric Mission简称“FCPM”)在柬埔寨文化和美术部与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合作协议框架内建立了一个工作计划,以新的方法和方式重新启动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收集新的考古数据,以更深入地了解洞穴居民的年代、文化和社会复杂性。迄今已完四期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超过80平方米,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穆雷发掘的探沟,主要位于洞穴中部2号室(Ⅱ区)。

朗斯滨遗址地层是柬埔寨和东南亚大陆最长、记录最详尽的洞穴之一。目前在洞穴地表上记录了20多个地层单元,深度达5米,但未到达基岩(图4)。在距今71000至3300年的时间段内,洞穴地层序列确定了前和平文化期、和平文化期和新石器时代(主要遗迹是墓葬)三个主要居住时期。

距今约3500年前,朗斯滨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群体的墓地,墓葬打破了前和平文化时期(狩猎时期)和平文化时期的居住面。迄今为止,已在地层中发现了六座新石器时代墓葬(深度为120厘米)。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陶釜、粗柄豆)、骨质装饰品(项链、动物牙齿)、石器(石珠、有领石璧、有肩石铤)等。其中陶器器形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器物组合以陶釜/粗柄豆、有领石璧、石铤为主。在葬式方面,所有男性尸骨的埋葬初始姿势和头向(东南/南)都相同:屈肢葬/仰卧、双膝抬高,双脚平放在地面上。与男性不同,单身女性的头部朝北。

距今11000至5000年间,厚达30~40厘米的黑色地层中发现了和平文化时期狩猎采集者的生活遗迹,其中包括以不同类型的锋利鹅卵石工具为特征的石器工业,各种动物骨骼。这种石器组合非常具有代表性,是越南、老挝、缅甸、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和平文化晚期狩猎采集者人类群体的代表。

距今71000、26000 和11000年开始,在地层的最底部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证据。这一级别的活动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它在柬埔寨的任何其他史前洞穴遗址中都没有被记录过,它使我们能够展示在和平文化狩猎采集者出现之前,洞穴环境中人类活动的更早阶段。在这个古老的文化层面上发现的石器(距今11000至26000年前的燧石和距今71000年前的大量鹅卵石工具)与和平文化传统(在角岩原材料上打制鹅卵石形状的工具)不同,表明了明显的文化/技术变化。

现在走进朗斯滨遗址内依然能够看到当时考古发掘时留下

柬埔寨考古遗址考察记(上)

援柬埔寨吴哥古迹王宫遗址联合考古队

的痕迹。2号室内Ⅰ区的考古发掘探方以及在Ⅱ区地表上现代陶釜内收集的古代人骨遗骸(图5)。偶尔还能在洞穴内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石铤(图6)。

毫无疑问,朗斯滨遗址具有巨大的文化研究和人类历史发现潜力,因为它是柬埔寨发现的唯一一处具有悠久考古序列的史前洞穴遗址。此外,鉴于其考古研究潜力和该地区人类进化背景下的文化意义,该遗址可被视为研究东南亚和平文化的参考。

(执笔:刘汉兴 参与考察人员:刘汉兴 Sorn Chantham, Chan Narin)



图1 远眺Phnom Teak Treang(自东南向西北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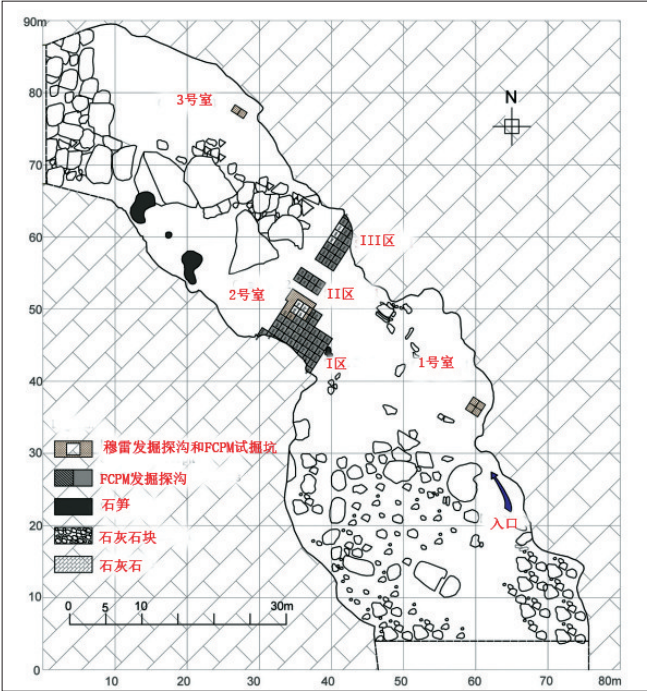


图2 洞穴遗址的平面图及分区(图片来源: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5,略有改动)



图3 洞穴遗址入口处



图4 FCPM发掘区(Ⅰ区)



图5 现代陶釜内存放的古代人骨



图6 洞穴遗址内采集到的尖状石器